

新中国70年对既有发展趋势的突破和历史性演进的跨越发展

郑有贵

摘要:对于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仅从物质财富增长进行探讨是不够的,而对新中国70年突破既有发展趋势和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演进的跨越发展进行研究,能够更充分地呈现历史性成就取得来之不易及其历史地位。70年间,新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发展起点的现实困境、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劣势窘境对发展空间锁定等既有发展趋势,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经济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跨越,实现发达程度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提升的跨越,实现民生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到小康富裕提升的跨越,实现在全球发展中的位势由跟跑追赶向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转变的跨越。这是新中国70年跨越发展的内涵及其光耀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历史发展趋势;现实困境;劣势窘境;阶段性突破;跨越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6-0005-07

一、跨越发展是对既有发展趋势的历史性突破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有没有能够实现这70年跨越发展的预期?如果从既有发展趋势分析,是难以形成的。在世纪之交,国内外将中国的发展成就称为“奇迹”,提出了“中国之谜”概念,甚至视中国取得“奇迹”为“悖论”,这也表明新中国70年已实现的跨越发展,不可能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预期之内的目标。新中国70年实现跨越发展,是对以下既有发展趋势的历史性突破。

1. 跨越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前长久陷入徘徊趋势的突破。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其发展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曾是最富裕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的发展也曾陷入徘徊,被西方超越,到近代因为落后被列强瓜分而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位次,因基于人均GDP或GDP总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人均GDP的研究表明,距今1000年前,中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宋代的生活水平领先于世界,在之后长达9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而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荷

兰、英国等国家则历时3—7个世纪超过中国^[1]。基于GDP总量的研究表明,西方超过中国要晚一些。例如,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显示,中国被西欧超越不晚于1500年;彭慕兰认为,西方超越中国的“大分流”发生于1750年甚至是1800年之后^[2]。至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处于顶峰是在哪个年代,什么时候被欧洲超过,由于没有相应可靠的数据支撑,难以作出精准判断,存在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工业革命的兴起所引发的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必然导致仍徘徊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发达程度上的分化及差距的拉大。仅据麦迪森的数据显示,1820—195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2%,远低于同期美国的3.67%、欧洲的1.71%、日本的1.74%、全世界的1.64%。同期,人均GDP的反差极为明显,中国为-0.10%,而美国为1.61%、欧洲为1.05%、日本为0.95%、全世界为0.93%^[3]。

从更近一些的20世纪前半期看,中国发展陷入徘徊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还进一步恶化。有数据显示,1913—195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中国为负值,即-0.02%,世界为1.82%。同期,中国受人

作者简介:郑有贵,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中长期项目“政治经济学视域的新中国跨越发展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口较快增长影响,人均GDP下降幅度高达20.5%^[4]。20世纪前半世纪这种中国与世界在经济增长上的正负反差,表明中国陷入了极其严峻的积贫积弱境地。

以上都表明,中国的传统社会约束了生产力发展,也表明突破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历史性难题,以此进行趋势分析,新中国70年不可能实现跨越发展。

2. 跨越发展是对新中国发展起点现实困境的突破。一个时期发展预期的形成与其起点的发展状况相关。新中国发展的起点,用文学语言“一穷二白”比喻,似乎有些夸张,但反映新中国在成立之际与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差距则是贴切的。仅以当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为例,旧中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只能生产纱、布、火柴、肥皂、面粉等为数甚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5];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品原煤、原油、钢的产量分别为0.32亿吨、12万吨、15.8吨,分别仅为美国的7.34%、0.05%和0.22%^[6]。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很是感慨地说: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不仅工业水平低,还缺乏农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西方一些人士就断言,中国政府解决不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因此站不住脚。这样的断言,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吻合的。新中国成立时仍然使用传统经验技术,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低下生产力约束。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糖料产量分别只有208.95公斤、0.82公斤、4.73公斤、5.23公斤。在如此低的农业产出水平下,要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无疑也是历史性难题。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困扰农民的发展,也困扰整个国家的发展。除工农业物质技术条件的现实困境外,还有人力资本水平极低对发展的约束。现代工业的发展,与传统手工业发展靠经验技术不同,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然而,1949年全国人口文盲率高达80%,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初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只达到20%和3%,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仅有11.7万人^[5],如此低的人力资本和教育水平,经济建设缺乏相应人力资本的支撑。

3. 跨越发展是对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与先发国家在发展上存在势能差约束的突破。旧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新中国发展起点的现实困境,都是自身

的因素。更为严峻的是,在工业革命兴起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存在较大的发展势能差异,这不仅仅表现为发达程度、科技水平高低不同下的发展能力之差,更表现为先发国家凭借其综合国力在政治军事上实行霸权,控制国际经济社会秩序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以实现了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和非经济的侵蚀,进而压缩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使后发国家很难突破劣势窘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仅有极少数后发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原因。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由于与先发国家存在较大发展势能之差,受后发劣势约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抑制中国发展而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就是其举措之一。

综上所述,新中国在成立前后,基于既有发展趋势是难以形成能够实现这70年的跨越发展的预期的。新中国70年突破旧中国长久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发展起点的现实困境、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劣势窘境对发展空间锁定等既有发展趋势,表明所实现的跨越发展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彰显了发展路径探索的成功,以及寓含了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如果仅停留在中国取得跨越发展奇迹属于“悖论”,则陷入了理论的僵化。

二、跨越发展是在日益积累进程中实现的历史性突破

突破既有发展趋势的锁定,必然困难重重,决定了新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甚至要付出试错的成本。新中国70年的跨越发展,经历了阶段性突破。

1. 1949—1978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突破既有发展趋势,为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明确了要把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国的国家发展目标。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把国家工业化视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启之年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元旦社论中提出:“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着重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重工业。”“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8]1953年中国共产党确定的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蓝图及其实现的时间表。1956年,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目标及其实现的时间表又写入了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即“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9]。

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创业,新中国从成立起至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在非均衡增长进程中,作为当时的先导产业——工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使中国经济稳稳地立起来。在当时被视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业之一的钢铁业,中国钢铁产量由100万吨提升至500万吨仅用了5年(由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到1957年的498.7万吨),远短于美国用的12年(由1880年的127万吨增加到1892年的500万吨)、英国用的23年(由1880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03年的503万吨)。到1963年,中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75年超过英国。到1978年,中国生产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铁、原煤、原油等分别为3178万吨、6.18亿吨、1.04亿吨。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8亿元,到1978年增加至16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5],比1953—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也高出0.5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演进,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1978年分别为28.2%、47.9%、23.9%,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比,发生了质的演进。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用两年零八个月到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所用时间远小于美国的七年零四个月),到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1974年,中国核潜艇首艇交付海军使用。鉴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缓和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换言之,基于工业化发展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对于推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改善发挥了作用,也为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对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是否缓慢的问题,应当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1978年的

GDP是1952年的4.75倍,年均增长6.43%,这一增速与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趋势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突破。另据麦迪森的数据,1952—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39%,虽略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59%(这期间的增长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增长,其中拉美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更为显著),但高于欧洲的4.37%和美国的3.61%^[3],高于高收入国家的4.3%^[4]。这一现象是复杂的内外因素的结果。外部因素有,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推进经济建设不仅受后发劣势约束,还受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影响。继新中国成立起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禁运封锁,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后又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同期的拉美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没有遭受如此扼制,而是处于较有利于其发展的国际环境。换言之,在发展的国际环境上,中国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是不对称的。内在因素有,中国急于求成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冲击了原来稳步有序的发展计划,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搞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可见,对改革开放前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与世界的高低分析,应分时段考察,不能笼统地把经济发展速度低的原因简单地归于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对计划经济体制在快速推进工业化上的成效视而不见。

2.1979—2012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砥砺奋进,实现实业和经济总量的跨越发展。1979—2012年,中国经济实现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高出7个百分点^[5]。在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位列第11位,到2010年超越日本而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到2012年增加到11.4%,比1978年提高了9.6个百分点^[5]。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的实现有以下因素。

第一,跨越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基础上实现的。1979—1984年率先成功突破的农村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增长,这是在此前科技、化肥、农田水利、农机等发展所奠定的基础上实现的,或者说是在此前提升了的生产力的快速释放。1979—2012年实现跨越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在此前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国有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在工业中仍然是主体,即便乡镇企业(1984年中央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

是在国有企业的先导产业带动及其先进技术、各类人才的帮助下实现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已有一定发展,特别是在所形成的兴办社队企业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没有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工业的高速增长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是不能割裂的,不应把1949—1978年排除在跨越发展进程之外,而认为跨越发展仅仅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

第二,跨越发展是在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先发国家制造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机遇中实现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跨越发展,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发展实业,在2010年工业增加值超过此前长期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美国。中国实业实现这一跨越,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先发国家制造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机遇。先发国家之所以积极把制造业转向中国,是因为在这期间,属于后发国家的中国,能提供大量充裕的低价劳动力,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则使这种产业转移变成现实。这样一个产业承接过程,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起步,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技术水平和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能够升级为90年代开始承接相对完整产业的转移。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的大市场吸引跨国资本、先进技术进入,但中国的大市场并没有换来涉及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仅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在引入外资及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技术后,成为世界汽车生产第一大国,不少利润由跨国资本索取。在美国掀起中美贸易战时,把两者自愿和都受益的技术引进(一般与资本引进捆绑在一起)定性为强制引进,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简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实现的跨越发展,属于工业发展带动下的实业发展的跨越,属于经济总量快速增大的跨越。

第三,跨越发展是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实现的。这一时期,先后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面对这两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增长、促就业,在外需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把着力点放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消费增长上。不仅如此,还以大国的责任担当,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香港、澳门走出遭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困

境。中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的起稳回升,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越来越显著,进而实现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的跃升。

3.2012年至今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和新发展理念下开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向经济强国发展的新跨越。中国经历1979—2012年长达34年的年平均9.9%的高速增长,属于以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的跨越,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这成为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的全新历史坐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纳入“十三五”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9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开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向经济强国发展的新跨越,以促进中国经济创新力、竞争力的增强。

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在创新发展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5],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绿色发展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并日益转化为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实际行动;2013年至2018年,全国生态状况呈改善趋势,完成造林面积达396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有所提升;2018年全国生态状况评价显示,生态环境状况优良县域达1561个,同比增加103个;2018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用水量分别比2012年下降23.3%和27.5%。在协调发展上,大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开放发展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上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的经贸制度。在共享发展上,2013—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3%,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高了0.3个百分点;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形

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5个百分点。

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促进了高质量发展。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明,反映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19个约束性指标改善,其中18个指标完成全年目标,只有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这一项指标没有实现(因向华北地区进行生态补水和全国生态用水量增加等综合因素而降幅比全年目标低0.1个百分点)^[10]。2013—2018年,中国工业逐步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11.7%和9.5%。2018年,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为18亿部、3.1亿台和1.9亿台,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份额高达70%—90%;汽车产量为2 781.9万辆,在全世界连续多年居第一位;高铁动车组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的靓丽名片^[5]。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2018年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份额为30%,比1999年提高了17.3个百分点^[5]。中国自2013年第一次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货物进出口超过4.6万亿美元,在全球所占总额达11.8%^[5]。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跨越的开启,不仅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新中国70年的跨越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即便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有增长速度高低的波动,有增长方式的改进,有增长贡献因素的变化,构成了新中国70年跨越发展的整个历史。70年发展历程是不能割裂的,更不能把前后阶段对立起来。这样一个阶段性突破的历程,是以前期发展为基础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

三、跨越发展是经济社会转型演进的历史性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经济实现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当时用“奇迹”一词称赞中国取得的成就,这是国际视域下的判断,但当时的关注点集中在GDP的增速。现今,中国经济又经过约20年的发展,仅仅强调GDP的高速增长,不能全面反映新中国70年发展的历史性成就。鉴此,用跨越发展或跨越发展奇迹能够更全面反映新中国70年发展的历史性成就。70年间,新中国所实现的跨越发展不仅是在增速上的奇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而中国仅用了几十年就走完了,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质的突破——经济社会转

型演进的跨越。具体而言,新中国70年实现跨越发展的历史性成就,突出体现在4个方面。

1. 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演进,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跨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农业社会。有研究表明,1913年人均工业化水平,中国仅3,远低于美国的126、英国的115^[11]。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农业高达70%,工业仅30%。到经过3年快速恢复发展的195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高达50.5%,工业增加值仅为17.6%,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第二产业增加值也仅有20.8%;全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还高达83.5%,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7.4%。70年间,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 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970.6倍,年均增长11.0%^[5]。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演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工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发生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1959年,前者为37.4%,后者为26.7%,两者相差9.4个百分点。这一现象的发生,既有“一五”计划起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战略,以及“大跃进”运动中向工业过度倾斜的因素,也有受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影响导致农业生产大幅下滑所致。1961年起,即仅两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又低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份额,这一变化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加强农业发展以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所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快速推进,到197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工业增加值再次高于第一产业,并不断持续,从此第一产业再也没有追上工业,而且差额逐步拉大,到1978年达到最高峰值44.1%。随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到1990年降至阶段性低点,仅为36.6%。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起,工业增速再度提升,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又逐步提升,到2006年回升到历史上的次高值,即42.0%,比1978年仅低2.1个百分点。之后,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逐步回落,到2018年下降为33.9%,比1978年的历史最高值低10.2个百分点。2018年,在GDP中的份额,第一产业下降至7.2%,第二产业为40.7%,第三产业为52.2%^[5]。2007年开始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不是因为农业增加值份额的上升(实际上仍呈下降趋势),而是

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份额的增加。到201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第三产业为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历史性演进,中国城镇化实现历史性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8年的59.58%。这些都表明,中国已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结构性巨大演进是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2. 发达程度快速提升,实现由低收入国家迈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跨越。有数据显示,1913年人均GDP(\$1990GK),中国为552,仅为美国5301的10.4%、英国4921的11.2%^[1]。中国在经历战争摧残和人口快速增加后,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的快速恢复,1950年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4.69%^[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1962年只有70美元,到1978年尽管大幅度提升到200美元,但仍属于低收入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大幅提升,2018年达到9470美元,比1962年增长134.3倍。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由1962年的14.6%,提升到2018年的85.3%,即提高了70.7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中,中国由1978年在共计188个经济体中居第175位,提升到2018年在共计192个经济体中居第71位,提高了104位^[5]。中国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与高收入国家门槛近在咫尺。

3. 民生大幅改善,实现人民生活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到小康富裕的跨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奋起直追的进程中,统筹长远与短期发展,国家通过实行高积累、低工资(收入)、低消费政策快速积累工业化所需资本,而以艰苦奋斗及与之对应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则得到全国建设者由衷的响应,同时也注重改善民生。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调整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两者并进。1979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世纪之交,中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之际,针对长期注重经济发展而民生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把民生改善提升到突出地位,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起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70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跃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9.7元,提高到2018年的2822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幅达6.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18年的19853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8.5倍,年均实际增幅达5.6%^[5]。按照2010年标准,1978—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由7.7亿人减少为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至1.7%。从综合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较高,分别为57.5%和67.7%,之后逐步下降,到2018年分别降为27.7%和30.1%(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全国居民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0岁;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200‰,下降到2018年的6.1‰;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

4. 在全球发展中的位势大幅提升,实现由跟跑追赶向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转变的跨越。作为后发国家的旧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7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9%的增速。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8%大幅上升到2018年的15.9%。自2006年起,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第1位。1979—2018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2013—2018年更是提升到28.1%^[5]。

上述所示,新中国70年突破既有发展趋势,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提升、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到小康富裕飞跃、由跟跑追赶向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转变,是具有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的跨越发展。新中国70年跨越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彰显出新中国光耀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王珏.试论70年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基于1千年主要国家赶超历程的考察[J].教学与研究,2019(9):58-70.

[2][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

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3][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7.

[4]蔡昉.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和启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3讲[EB/OL].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8/e3b15ac9f8f14dfcb2a97b7fd0ae2bed.shtm>.

[5]《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100;225;100;37;40;39;101;171;170—171;99;366—368;46—47;4;51;15;4;38.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工业五

十年:第一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9.

[7]毛泽东文集: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9.

[8]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1版[N].人民日报,1953-01-01.

[9]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24.

[1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9-03-18.

[11]N.Crafts, K. O'Rourke.Twentieth Century Growth, in P. Aghion & S. N. Durlauf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M]. Elsevier B.V.,2014,p.271.Table6.3.

New China's Breakthrough of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Trends and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Zheng Yougui

Abstract: compared with merely talking about the growth of material wealth, studying on how new China has broken through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trends and how it has realiz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n more clearly highlight the hard-won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New China has successfully broken through the long-standing cycle of the old China;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ock-in of the development space by the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just a few decades, new China has comple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us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New China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a low-income country to a medium-income country; from being not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to the well-off level; from the chaser to the biggest engine of the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This i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its historical status.

Keywor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s; realistic dilemma; disadvantage; stage breakthrough;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岩 芜)